

家训家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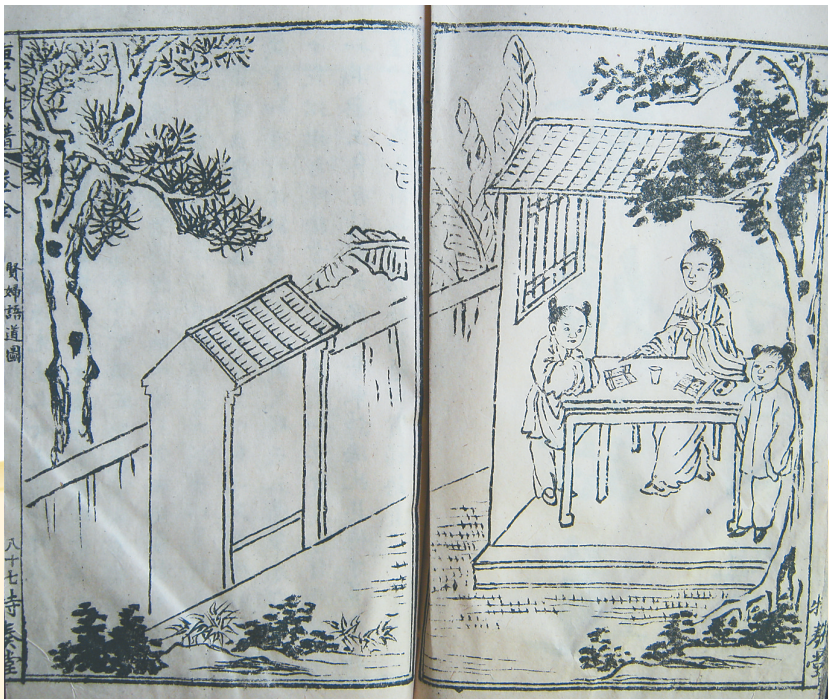
史籍典录

古人书斋命名雅趣

■ 子安



西洲书院的旧址。  
重修后的海口市攀丹唐氏大宗祠，这里也是明代张意薇摄



海口攀丹唐氏族谱《十二图咏》之《贤妇语道》。  
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耿摄

【编者按】

明代是海南科举的高光时刻，其中父子进士就有四对，而琼山县（今海口市）攀丹村就占去了两对，分别是唐舟和唐亮、唐胄和唐穆，此外有据可考的举人至少十人。即使没有考取功名的攀丹唐氏男儿，很多也德行高洁，美名传扬。这得益于这个家族优良的家风传承，这当中唐氏家训对教化族众无疑起到了积极、正面的作用。

## 琼州府城东厢唐氏攀蟾折桂非一时之功

■ 张意薇

在海南文化史上，丘濬、海瑞素有“海南双璧”之美誉，其德业文章，彪炳青史。然而清末民初学者王国宪在遍览乡邦文献后，却对一个家族给予极高评价。他在研读民国《攀丹唐氏族谱》时慨然叹曰：“祀乡贤、名宦、孝弟祠者，有其人；登名贤、儒林、文苑、独行、隐逸传者，更有其人。为丘海两姓所不及，吁！何其盛也。”

尤其令王国宪称赏的是族中所传的《十二图咏》：“其表章十二图咏，俱前贤明迹，更为丘海两姓所未有，海南谱牒之修，未有盛于此者也。”丘、海乃一代名臣，攀丹唐氏为绵延数百年之琼州望族，王国宪之意并非谓丘、海之德业不如唐门子弟，而是赞叹唐氏一族累世积德、群彦蔚起，其家族整体之人文气象，在海南实属罕见。

攀丹唐氏，这个自宋末落籍琼北的家族，何以能代出贤达、文脉相承？答案深藏于其家训之中。翻开《攀丹唐氏族谱》，可见其所立纲领：尊祖报本；睦族大典；礼义廉耻勤俭最为立身治家上策。

“治家上策”之“廉”，族谱有训：“廉则千驷弗视，一介不取；心清志洁，而争讼自无矣。”纵有千驷之富，非义不视；虽一芥之微，非分不取。心既清明，何来纷争？

七世祖唐舟官至监察御史，清操自守，尝题门联云：“雪霜半染中年鬓，天地应知暮夜心。”其意在于昭示：白发虽生，初心未改；暗室不欺，唯天可鉴。

九世祖唐胄曾任云南右参政，赴京朝贺前，郡县依例馈赠，唐胄悉数坚辞。舟与胄，两位唐家先贤的名字被刻在攀丹村口的石头上，皆以一身清节，为家族立下道德标杆。

“俭”与“廉”相伴而生。族中清代万州（今万宁）举人唐焕章作《十戒诗》，第九戒专谈奢侈：“俭可养廉名训垂，休将财物斗华靡……待看兴尽悲来日，回首当年悔已迟。”字字警策，直指浮华之弊。

唐舟致仕归里，“家无担石之储，处之晏如”；唐胄平生“素性俭，衣履不择敝好”。俭非吝啬，乃以约养德，以淡泊远祸。今人常有寅支卯粮之困，殊不知数百年前，唐氏早已以家训为镜，照见奢靡之危、俭朴之安。

至于“勤”，唐焕章在《戒惰行》中谆谆告诫：“儒生立志贵超群，切实工夫只在勤。”又言：“圣哲岂皆资质美？修德惟向此中分。”圣贤非天生颖悟，德业皆由笃行积累而成。此语非仅勉学，实为破除恃才怠惰之蔽，强调后天修为方是立身之本。

今世常言道：“家是讲爱的地方，不是讲理的地方。”然而唐氏治家，爱与理并重。亲情非无原则之溺爱，而须以规矩为经纬。族谱明示亲子之道：子女以“孝”为本，父母以“慈”为先。

所谓“言必诚实，行必笃敬，则醇谨之习成”，既要求子弟言行端谨，亦暗含父兄须以身作则、言行可范。族训亦强调父母的教化之责：“训海必延良师，毋惜修脯之费。”大意是，请好老师来教孩子，别怕费钱。

七世祖唐瑶之女唐朝选，嫁与临高王原恺。丈夫早逝后，她携子回唐家延请良师，悉心培养。其子即后被誉为海南“吟绝”的王佐。后人建“慈训堂”以祀唐朝选，非徒嘉其抚孤之慈，更重其识教之明。

兄弟之间须“敬兄弟以崇爱”：一劝兄友，二劝弟恭，能在危难之际挺身而出，利益当前甘让于手足。

唐氏九世祖唐继祖之弟因亏空官料，面临责罚。继祖毅然倾尽家资代为填补，甚至动用了妻子冯银的陪嫁。令人感佩的是，冯银毫无怨言，此事传为乡里美谈，亦成为唐氏“友于兄弟”家风的生动注脚。冯银正是“十二图咏”中《贤妇语道》的主人公，平生一乐事，便是灯下伴二子诵读诗书。她知道，真正的家业不在田产箱奁，而在敦亲睦族，诗礼传薪。

婚姻大事上，唐家人更是清醒得不像古人。他们的家训至今并不过时：“长大方知贤否，幼少莫定婚姻。”别搞娃娃亲，感情要时间检验。

“收奴之费毋勉强。”嫁妆量力而行，莫要打肿脸充胖子。

“媒妁之言难尽信。”介绍人的话听听就好，关键还得自己看。

这些婚恋指南，应该极大降低了唐家几百年来“怨偶”的出现概率。

于唐氏而言，家族之义，不止于同宗共祖，更在于以礼睦族、患难相恤。族训有言：“论尊卑长幼，不论富贵明愚。”族中位次依伦常而定，不因家世厚薄、才识高下而移。富者不骄，贫者不卑；智者尽其能，愚者安其分。此乃以礼治家，非以势凌人。“三要四务”亦条理分明：三要者，尊尊（敬长辈）、老老（敬老人）、贤贤（敬贤者）；四务者，矜幼弱（抚育孩童）、恤孤寡（周济孤寡）、周窘急（赈助困厄）、解忿竞（调和争端）。

这些并非束之高阁的训条，而是代代躬行的实践。唐胄曾祖唐道方晚年常倾力助贫者完婚葬、济急难，乡人感其德，称其为“真长者”。《十二图咏》之《榕树垂芳》便赞其仁德如古榕荫蔽乡里，清芬流布后世。这种基于血缘与伦理的互助机制，在缺乏现代社会保障的年代，为族人提供了切实的依靠。

在教育孩子方面，族训也有“教育指南”。如今不少家长为“鸡娃”焦虑，为“熊孩子”头疼。唐家人早就给出了答案——因材施教，静待花开。族谱里写道：“责效毋庸太急，期许不必过奢。”别指望孩子一学就会、一考就第一，成长需要时间。这是来自数百年前给焦虑家长们开的一剂“降压药”。

同时，他们也反对“佛系育儿”：“勿以年稚而宽，少成乃若天性。”小时候不立规矩，长大就难改。习惯要从小养成，不是等“懂事了”再教。最打动人的，是对“普通孩子”的尊重：“勿因质鲁而废，习惯便成自然。”别因为孩子反应慢、成绩差就放弃。优良品格不是天生的，而是靠日复一日的家教熏陶出来的。这种不唯分数、重视品行的教育观，放到今天依然闪闪发光。

《诗经·周颂》曰：“秉文之德，对越在天。”意为继承先世德业，上对苍天，下示子孙。“对越”为供奉唐一世唐虞的晋祠名匾，侍郎唐胄亦取此意，曾建“对越亭”于攀丹唐氏大宗祠。攀丹唐氏亦以此行为：图咏载德，诗训传廉，家规守礼，用家族族训昭示子孙——所从来者何，所当行者何。

（作者系海南工商职业学院副教授）

## 《驿使图》上的“快递小哥”

■ 周惠斌

上世纪70年代，甘肃出土的魏晋时期画像砖《驿使图》，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，画面上“一骑绝尘”的驿使，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古代邮驿形象，被昵称为我国古代的“快递小哥”。

1972年初，甘肃嘉峪关市新城乡新城村的两个羊倌，在戈壁滩牧羊时无意中发现了一处隐秘墓葬。不久，中国历史博物馆专家探知，在嘉峪关以东、酒泉市以西近13平方公里的戈壁滩上，散布着1400多座魏晋时期（220年—420年）的地下墓葬群。1972年4月至1979年，考古人员对该片被命名为“新城魏晋墓葬群”进行了7次不同规模的发掘，涉及墓葬13座，其中8座是砖壁壁画墓，共出土600余块彩绘墓砖壁画。画像砖《驿使图》展现了一人一马在大漠孤烟下，快马加鞭、风驰电掣赶送文书的急切情景。

《驿使图》纵17厘米，横35厘米，厚5厘米，米色设底，黑色轮廓线，马身涂黄色，点缀红色斑块，绘于3世纪前后，艺术地再现了距今1600多年前西北边疆的驿使，一骑绝尘的邮驿情形。画面上，形似当下“快递小哥”的驿使，头戴黑幘进贤冠，身穿右襟宽袖衣，骑跨红鬃烈马，足蹬长靴，左手手持梁传（过关时的信物凭证）文书，右手紧控缰绳疾驰，驿骑四蹄腾空，凸显出驿递任务的重要和紧迫。驿使神情肃穆，面部没有嘴巴，一种观点指出，这是旨在强调晋

日邮驿事关军务、政令，保密性强，职责要求必须守口如瓶。驿马的刻画尤为精彩：马首高举，鼻阔耳削，目大有神，颈粗臀肥，胸廓健壮，细腿小路，筋腱毕露，长尾平甩，尽显宝马良驹快如闪电、急如星火、高速驰骋的英发雄姿。

整幅《驿使图》笔法简洁，线条流畅，画风洗练，融写实和写意于一炉，白描重彩，寥寥数笔，形神兼备，高度体现了魏晋壁画所崇尚的创作手法和艺术风格。

《驿使图》出土后，一度作为中国邮政的标志参加世界万国邮政博览会，并作为

嘉峪关市的城市符号，矗立在火车站广场上，诠释出一种忠诚、负责、守信、高效的人文品格和城市精神。1982年8月25日，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，原邮电部以《驿使图》为邮票图案（将背景和人物衣服改为浅蓝色），发行了一枚面值1元的《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》小型张，票图古朴典雅，边衬大雁底纹，不仅契合纪念主题，而且象征鸿雁传书的美好寓意，《驿使图》也因此成为中国邮政的“形象大使”而广为传布。

1994年，原国家邮政储汇局发行首



款全国通存通兑的储蓄绿卡时，又选用了《驿使图》作为卡面图案。此后，《驿使图》在中国邮政及其储蓄领域不断续发再版，尤其是覆盖面最广的金融借记卡，走出国门，流通海外，接续演绎着“一人一马走天涯”的“驿途”传奇，向世界展示着它源自中国的古典之美、磅礴之力……

邮驿是古代为传递政令、军情而专设的机构，它既服务于官府，也为平民寄送信函，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。驿使，也即信使，古代专车传递文书叫传，骑马送信叫驿，步行传函称邮。3000多年前，周代就已有颇具规模的邮驿系统。秦统一中国后，建立了以咸阳为中心的驿站网络，交通要道上多有供驿使食宿、换马的驿馆。汉代的邮驿系统由州、郡、县三级管理。

邮驿在唐代日趋完善。据《大唐六典》记载，各地共有1639个驿站，驿务人员达2万多人。清代，全国有官驿1600余处，驿卒7万余名，驿马4万多匹，数量甚是庞大。然而，随着现代邮政的兴起和发展，曾经驿卒飞驰的邮驿，连同分布各地的驿道、驿站，渐行渐远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，隐匿在浩瀚的诗词歌赋和文物古迹之中。

1600多年前出现的画像砖《驿使图》。  
甘肃省博物馆藏

在中国传统文化这片星空之下，那些高悬在书斋之上的匾额好似群星闪烁，它们并不只是标明一处物理空间位置，更像是照亮文人精神世界的一盏灯。这些有趣的室名——汲古阁、梦溪园、陋室、万卷楼等等，并非仅仅是居住之处的名字，而是文人将物理空间转化为精神场域的佳作，共同构建起一种独特的“空间诗学”，让书房不只是单纯的砖瓦木石，还是安放灵魂的地方。

书斋的名字，或许是古代文人抵抗时间流逝的方式。

沈括把他的园子叫“梦溪园”，他完成的不只是地理位置的确定，而是把缥缈的梦境锚定在坚实的大地上的仪式，那个他梦里无数次游览，醒来就念念不忘的山水之地，在江苏镇江竟有对应的地点，这种震撼和确认，让他不得不把这份奇迹用“梦溪”之名钉下来，名字成了虚幻和现实，短暂和永恒之间的桥梁。

毛晋的“汲古阁”，“汲”这个动作本身，就已经包含了从时间的深井中捞出宝贵的东西的意思。在明末那个动荡的日子，他好像要凭自己一个人的力量，靠这个名字，建立起一座抵挡文化消失的堡垒。每个书斋的名字，都是主人住时间的大河里投下的锚，想在变来变去的世界里找到一块永恒常驻的地方。

这些命名，其实也是文人给自己的物理空间“赋形”。

刘禹锡的“陋室”最典型。“陋”本来就是物质条件的客观写照，但经过《陋室铭》的书写，就变成了一种精神标识。苔痕草色，成了风雅的点缀；谈笑来往，也没有白丁鸿儒的区别。空间被人的德行情趣重新定义，物质的贫乏反衬出精神的高洁。“陋室”的命名，完成了对空间价值的一次重塑和升华。

而陈寿的“万卷楼”则是一种空间的建构，倚岩而建的三重楼阁，其雄伟不在于飞檐斗拱的建筑形制，而在于其中收藏的万卷典籍所构建起来的知识殿堂，楼阁因藏书而崇高，空间因思想而庄严。

尤其深刻的地方在于，书斋之名成了文人所向往的理想人格和现实处境之间微妙的调和剂。毛晋“屡试不第，遂隐居故里”，科举仕途的失意也许正好促使他在“汲古阁”里另辟蹊径，藏书、刻书做出一番文化事业。书斋之名变成了一种身份的转嫁和确认，不能在仕途上“达则兼济天下”，就在文化传承中寻找自身价值。沈括晚年退出政治漩涡，在“梦溪园”找到了归宿，把早年仕宦生涯中的见闻思考凝结成传世《梦溪笔谈》，书房成了他完成身份转变的地方，由官员变为学者，“梦溪”之名就是对这个新身份的宣告。

这些传之后世的书斋之名不是孤零零的存在，而是构成了一个连绵不断的谱系，刘禹锡在《陋室铭》里高兴地把自己的“陋室”同“诸葛庐”“子云亭”并列在一起，这本身就是一种有意识的谱系建构，他是在表明：我所归属的不是当世权贵之门，而是历史上品德高尚、安贫乐道的那些先贤传统。文人们用书斋命名把自己嵌入到一个超越时空的精神共同体当中，在前人的身影里寻找认同，也为后人树立起精神坐标。

在我们理解了书斋命名背后的空间诗学后，再看当下的生活境地，就令人深思。如今人们住的房子越来越标准化、功能化，是否还有这样的意识和情怀，为自己精神生活留出一块地方，并为之命名？这个空间不一定是一间单独的书房，可能是家里的书桌边，也可能是阳台的一把椅子，或者是咖啡店的一个位置。这个名字是独一无二的，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精神上的自觉，是对抗同质化生活、寻找自我认同的微小但顽强的努力。

“万卷楼”“陋室”“梦溪园”“汲古阁”……这些流传下来的书斋名字，都在诉说着一个事实，空间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的容器，它还是精神的塑造者。文人墨客们用命名，把生存变成了生活，把居所变成了精神家园，在名的寄托和器的承载之间，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，也为中华文化留下了一幅幅细致入微的精神地图。这种把物质空间变成精神场域的智慧，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慢慢品味并传承下去。

文  
史  
荟

投稿邮箱 382552910@qq.com